



源流·历代治国评略

家 国 产 权

陈抗行 任伟礼 编著

ORIGINAL

历史源流 管理世界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国产权 / 陈抗行, 任伟礼编著.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7.4

(历代治国评略)

ISBN 978-7-5051-1484-5

I. 家…

II. ①陈… ②任…

III. 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D09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357 号

历代治国评略 家 国 产 权

陈抗行 任伟礼 编著

责任编辑: 王农媛 封面设计: 何丽佳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27 地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 (010)64037149 发行部: (010)64037154

印刷: 杭州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浙江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79.75 字数: 1050 千字

ISBN 978-7-5051-1484-5

定价: 300.00 元 (全八册)

目 录

家国产权的使命 /2

第一章

禅让谜局（一）

技术精英们的合法性盛宴 /6

禅让谜局（二）

产权伤痛记忆的反面追述 /12

禅让谜局（三）

一头“鹿”引发的“血案” /18

异相与传说：

开国君主产权合法性的标准版本解读 /24

第二章

秩序的崩溃：三个王的悲喜剧 / 32

暴虐的产权重组：当“革命”突然降临 /37

重商传统缘何败给了金戈铁马？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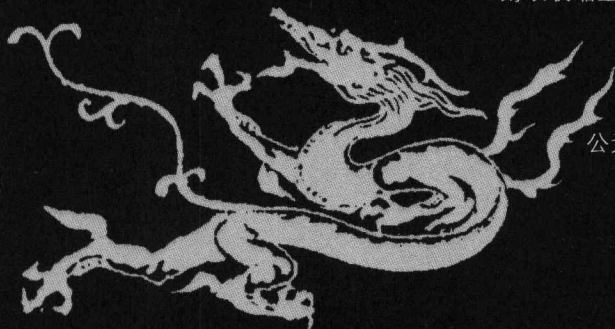
汉文帝的告别诏书：

财政收缩型时代的结束 /48

第三章

公元前 246 年的职业命运（一）

谋取国家产权的离奇版本 / 54



公元前 246 年的职业命运 (二)

做一只粮仓里的快乐老鼠 / 58

公元前 246 年的职业命运 (三)

廉颇大败局 / 63

功臣们的结局 /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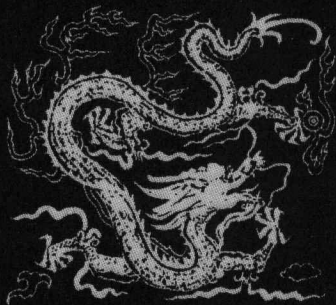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赵匡胤的游历未达草原 /76

内忧与外患 皇帝狂奔的启示 / 81

纯儒理想国 /87

朱元璋心路历程 /94



第五章

产权—代理的金科玉律 /100

朱元璋废相始末 /105

帝国太监往事 / 118

嘉靖后遗症 /126

皇帝与信息控制 /134

家国产权的千年宿命 /140

源流·歷代治國評略

家國產權

陳抗行 任偉禮 編著

紅旗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家国产权的使命

在进入正文之前，先解释几个疑惑：

其一，对家国产权的认知程度。通常人们会引用那句《诗经》里的名句来证明君主们对帝国各个角落无所不在的产权拥有要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诗经·小雅·北山》的原文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大抵意思是，那么多的差使，士子们每天都要去做，让父母忧心；大家都是一样的王臣，那些做大夫的做得却要少得多，而我却更有才能，也做得更辛苦。

关于这个误会，孟子其实早已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孟子·万章上》）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权利不平等的的不满——但千百年来，大家形成了一个错觉，仿佛家国产权就是指君主拥有其领地上的一切财产权和使用权。事实上，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各个帝国的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肆意践踏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势必危及其产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历代暴君的形象，也往往与其对民间索取无度联系起来。

其二，产权与财产权的关系。依照当代经济学的观点，产权是一种让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帝制时代，家国产权制度，决定了在利益分配上的顺序：“家”即皇室——贵族——代理集团——平民集团。纵然出现

各个帝国的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肆意践踏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势必危及其产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历代暴君的形象，也往往与其对民间索取无度联系起来。



产权更替，这个分配次序是不会改变的。

而财产权的稳定性是非常糟糕的，不仅利益分配链条上的中下环节的财产权容易受到侵犯，即便是排序第一的君王“家产”也不稳定，不仅受到觊觎者的威胁，也因产权收益分配体系的设置不公，而容易导致整个产权体系崩溃，即发生产权重组。

通俗地说，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君主们定下立国大计，即产权受益安排：土地某种程度的重新分配、税收的标准、官僚集团行为方式的规范，等等。用制度学家们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过程就是确认社会利益集团的过程，君主（后世为皇帝）们身兼“家”、“国”两重利益主宰的驱动力，与社会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划分和责任确定。君主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小金库”考虑，还必须承诺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在中国的帝制历史上，这种公共品一般是赈灾、治水、防务以及司法公正等事务。社会其他利益集团则相应地承担义务，缴纳各种税收。

合理的分配比例是保证内部稳定的基础，这也是历代帝国产权的根本使命。君权的毫无节制并不完全指君主个人的贪得无厌，更多的是指他们连基本的公共品都不能保障，或者大量提供了非必要的公共品，而导致帝国额外的税收增加——农耕社会财富积累速度缓慢，决定了整个产权安排必须要适应这种缓慢的节奏。

贵族们（包括功臣、皇室及其姻亲等）在这个分配过程中如果份额过大，则将妨碍家国产权的稳定。从经济学角度上看，皇帝诛杀功臣亦不失为一种相对平和的产权内部调整。

围绕着这个家国产权，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处于竞争或垄断状态下，将会有不同的产权配置。

当不存在来自外部的产权竞争，现有的家国产权是这块领地上的平民集团所需公共品的唯一的供给者，帝国对公共品具有垄断定价权——定价的尺度不能逾越帝国产权稳定

君权的毫无节制并不完全指君主个人的贪得无厌，更多的是指他们连基本的公共品都不能保障，或者大量提供了非必要的公共品，而导致帝国额外的税收增加。



历代君主对于“大一统”的追求，从产权角度考量，纯粹是为了翦除和消灭挑战者和竞争者。

性的警戒线，即不能触犯平民的基本生存权。因此，垄断的最后结果是导致这样的产权受益安排：保障平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剥夺剩余财富。

存在外部竞争的情况下，如在东周时代，平民实际上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如果对公共品的价格和数量不满意，他可以选择迁徙。“苛政猛如虎”，平民只好选择结伴逃入深山，逃往异乡，逃到帝国代理系统的触角伸不到的地方。

当然，如果帝国的领土过于辽阔，迁徙的成本过于高昂，也将制约这种对垄断带来的伤害的回避。因而，历代君主对于“大一统”的追求，从产权角度考量，纯粹是为了剪除和消灭挑战者和竞争者。

其次，维系这种产权安排，是通过产权委托——代理系统来实现的。代理集团的规模、素质和职业操守，将决定家国产权及财富的稳固及损耗程度。因此，对代理集团的监督与反监督、对信息权的控制与反控制，成了历代帝王及其臣子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回溯三千年历史，从规模上看，大宋帝国的代理团队是空前庞大的，从职业操守上看，明清两个帝国的代理状况是极为糟糕的——但更糟糕的往往是，皇帝们把“家国”的使命简化成了“家”的使命：家业当然是越大越好，欲壑无穷；而家国产权的使命，由于“家”对“国”的挤压，从此变得“家”高于“国”，甚至“家”取代了“国”。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

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慨然长叹：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之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第一章

我们不厌其烦地一一道破
“禅让”的产权变更真相，
是希望揭开道德判断的面纱。

事实上，
产权合法性的转移，
是一个资源积累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禅位谜局（一） 技术精英们的合法性盛宴

传统中国政治谜局中，涉及国家产权交割的，首先应推禅让制。这始于一个远古的传说。传说中，尧老了，把王位禅让给舜，而舜后来又把王位禅让给禹。

这个传说令后世的孔子内心充满景仰之情，并说了句：“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公开赞扬禅让制这种古老政治传统如巍巍高山般的伟大！

但不认同孔子论断的大有人在，由于这一古老传统早在千年前终结，战国时期的分析人士们只能基于现世的政治传统来判断：在国家产权家族私有的格局下，禅让制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征伐、内讧”才是主流，对尧、舜、禹非议、质疑、不屑乃至攻击的声音源源不断。楚国大诗人屈原就在诗歌《哀郢》中描述，像尧舜那样道德完美的人，竟遭遇“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于不慈之伪名”的尴尬。

此外，法家的韩非子认为真相其实是“舜逼尧、禹逼舜”；而《竹书纪年》^①中则称，所谓禅让，实际上是“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无论是对“逼”的指责，还是对“让”的赞颂，都不过是传统政治中常见的道德论断武器。而暴露所谓的被掩盖真相，并非本文主旨。我们重新提出尧舜禹时代的传说故事，是因为此中隐含了传统中国国家产权和平转让的一种重要方式。纠缠于个人的行为操守或者政治伎俩，并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重新提出尧舜禹时代的传说故事，是因为此中隐含了传统中国国家产权和平转让的一种重要方式。纠缠于个人的行为操守或者政治伎俩，并没有多大意义。



舜的发家历史，源于尧的信任和提拔。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尧作为部落联盟的共主，到了执政后期，已面临着重重社会危机，而最大的危机则来自洪水的威胁。尧在位期间，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所有百姓都为此非常忧愁^②。在治水的问题上，尧缺乏良好的表现，本身又不掌握治水的技术，也没能找到懂治理洪水的人。

至于其他的危机，如继承危机、用人不当的危机等，相比之下，显得并不是很重要了。水的危机一旦解决，其他难题也将顺理成章地被化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一个能系统解决问题的人才，是尧的当务之急。而对这个人才的要求是，不必是专业的治水技术人才，但必须得是协调能力强，具备人格魅力，并且会用人。舜正符合这样的要求。

大臣们向尧推荐舜的几个理由是：

第一，人品好并且善于与人相处。舜的父亲是个瞎子，而且愚昧，偏爱小儿子；舜的弟弟很傲慢而且野心勃勃，老是觊觎舜的妻子、财产和地位。瞎子父亲和弟弟曾多次企图暗算舜，但舜显然是个聪明且心胸宽广的人，每次都能巧妙地逃脱算计，并仍然与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

第二，舜的局面控制能力很强。在上述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舜仍然能把家治理好，并且还有力地约束了家族成员的行为，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

尧的一个缺点是耳根子软，过于善良，而且对部下缺乏约束。比如在任用鲧治水的问题上，明明知道鲧是一个问题人物，准备摒弃不用，但被大臣几句话一说，又改变了主意；明明知道共工是个花言巧语、放纵邪僻的家伙，但被大臣一撺掇，又用了他去做工师。所以，一切关于舜的赞誉，无疑弥补了尧性格上的不足，打动了尧的爱才之心，重新点燃了拯救危机的希望。

舜在最终获得尧的禅让之前，经历了长久考验，某种

一切关于舜的赞誉，无疑弥补了尧性格上的不足，打动了尧的爱才之心，重新点燃了拯救危机的希望。



角度看,说监视也不过分。尧把漂亮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以二女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并让他参与联盟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祭祀事务管理。但以舜的胸怀和气度,不至于为这样的小事而困扰,在经过人品、忠诚度、能力的长期考验之后,他获得了充分的信任,并着手改造尧的组织体系。舜的改造重点有三,都是围绕治水这一核心来进行:

其一,尧试舜五典百官,就是用伦理道德去约束官僚。这是一种制度建设,为大规模项目实施之前准备好人员的组合、调试及上岗培训。

其二,请示尧处置一批问题官僚。流放共工,放逐驩兜,迁徙三苗,并将治水不利的鲧处决于羽山之野。

其三,推荐鲧的儿子禹接替鲧来继续治水的大业。

当代学者黄仁宇认为,由于黄河经常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加之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变化又大,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因此,必须得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拥有足够的权威以动员所有资源,指挥有关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所有沿河部落安全的保障。

回到对国家产权问题上来:如果说尧时代的部落联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联盟的共主经推举而产生,并不拥有对所有部落的产权,那么,现在局势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以治水为契机、整合部落联盟所有资源的机会。

这个整合机会掌握在舜的手中。

同样,这个机会也掌握在禹的手中。

禹的经历比舜要简单得多。禹,出生于治水世家,是鲧部落的继承者,《史记》上称其是黄帝的一支后裔,与另一个治水世家——源于炎帝的共工部落并列。

鲧与共工的治水事业都遭到了挫败。《国语·周语下》描述,两大治水世家采用的都是同一种方法:“壅防百川堕高堙库,以害天下”,即把高地铲平,低地培高,在平坦地

局势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以治水为契机、整合部落联盟所有资源的机会。这个整合机会掌握在舜的手中。



面上修筑堤防。这种用土堤挡水的办法，由于没有疏通河道，水则漫流不遵其道，依然会泛滥成灾。

禹作为后起之秀，充分吸取了前人的教训，改防堵为疏通，最后一举成功。

治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治水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从禹的主要活动即可看出：

——开发土地、疏导河流，修治湖泊、测量山脉等；

——给民众分发稻种，使得民众可以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耕种；赈济无粮可食的民众；遇上粮食匮乏的季节，调剂余粮到缺粮地区；

——考察各地的物产情况，规定了应该向联盟首领交纳的贡赋，并考察了各地山川地形，水陆交通，确定诸侯朝贡的路线；

——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分出九个纳税等级；

——在华夏境内九州之中分封诸侯，赐给土地，赐给姓氏。

对于生存在远古社会的部落而言，掌握一种不容易被盗版的特殊技术，往往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崛起，意味着在将来从部落联盟走向国家过程中的天然合法性。

如炎帝部落（神农氏），掌握农具生产和使用、耕作饲养、制陶纺织等技术，成了南方的部落联盟首领；黄河沿岸的部落联盟首领则长期由黄帝部落（轩辕氏）垄断，这是因为轩辕氏的战争技术（其中包括指南车的发明）无与伦比，不仅彻底击败了蚩尤部落，还迫使炎帝降伏。

现在轮到治水时代的技术精英的话语权体现了。如果说炎帝、黄帝时代等同于原始生存与原始发展阶段，治水时代则意味着灾难应对、危机处理，意味着对剧烈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而这一切更具有社会重组意义。部落的传统荣耀黯淡了，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重要、更关键、更伟大的目标值得追随：治水，伴随着环境的改善，伴随着物资、

治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治水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



人力、财富的重新分配，伴随着大片新开垦的良田和村庄，这样的伟大功勋将被历史认可，同时将促成传统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

禹的权威与日增长。孔子曾在与人闲聊的时候说了个故事：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会稽山召开庆功大会，一个部落的首领防风氏迟到了，“禹杀而戮之”。

回归禅位这一话题，这是一场技术精英们的合法性盛宴。“禹杀而戮之”的符号象征意义更在于远古草莽中一个人事绝对权威的诞生。

危机往往是社会重组的契机。面对洪水的肆虐，禹作为治水技术精英，掌握了产权重组的主导权。

防风氏的鲜血证明了以下事实：松散、低效、无序的部落联盟必须终结，联盟部落相互封闭的系统被彻底打通，原始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无序的掠夺和纷争将让位于对产权秩序的尊重。

新的产权大联盟体系下，无数家族之间的交流、合作甚至联姻将加强。更重要的是，将在联盟领袖的领导下抵御各种危机——无论是危机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者，或是外在的自然和异族。

所有加入联盟的诸侯，都承认一点，即必须履行向联盟领袖进贡的义务；所有加入联盟的诸侯，同时强调一点，联盟领袖有制定产业规则、调解产业纠纷并排除突发危机的责任。

一个初级的国家雏形产生了，技术精英们在对社会重组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国家产权的绝对支配。

黄仁宇认为，治水大工程催化了古代中国政治的早熟，这话同样也适用于古代中国国家产权的形成——著名学者顾准一直有个疑问，远古中国的部落联盟接近希腊的城邦制度，但中国为何没有走上那种“城邦民主制”的道路？顾准在其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中描述了古希腊的国家产权状

松散、低效、无序的部落联盟必须终结，联盟部落相互封闭的系统被彻底打通，原始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无序的掠夺和纷争将让位于对产权秩序的尊重。



况：城市主权归属一切公民（指的是自由民，不包括奴隶），而远古中国的部落联盟时代，成员的“公民意识”尚无着落，就不得不追随首领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是追随，而不是授权。

重组之前的产权从未有过明晰，于精英们而言，那不过是无主之物罢了。所以有人就编造了“一兔走而百人逐”的寓言，指出统治天下和国家，首先就在于“定名分”。谁来定名分？当然不是平民，而是手中握有技术垄断权的精英。

尧禅位于舜，是因为尧的组织在新时代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舜禅位于禹，因为禹的垄断技术更具有竞争力，就像今天发明微软系统的比尔·盖茨一样。此外，在社会化大项目的统筹安排中，尧和舜依次淘汰出局，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人事安排、物质调度再也无法、无力干预——这个时候，还能不禅位吗？

注释：

① 西晋时期，盗墓者挖开了一座古墓，并发现了大量战国时期的竹简文献。后来，西晋学者对这批竹简进行整理，并出了一本叫《竹书纪年》的史书。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之间的历史。

② 不少民族都拥有远古洪水泛滥的记忆，如《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希腊人、印第安人的大洪水传说等。尧舜禹时代，大致在冰河期晚期，当时地球气温上升，大量冰川融化。



禅位谜局（二） 产权伤痛记忆的反面追述

在继续深入探讨禅位制之前，先说说两个虎头蛇尾的战争故事。

其一为东晋时期大将军桓温的第三次北伐。

晋帝国于公元280年攻占三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孙吴的都城金陵，统一又开始了，但这个局面仅仅维持了二十几年，就变得不可收拾：先是太子其实是智障儿，却当上了皇帝；接下来是皇后贾南风擅权；紧接着是八王争位爆发全国性内乱；最后北方长城外的胡人（包括匈奴、鲜卑、羯、羌、氏五个少数民族）的游牧骑兵给了晋帝国重重的一击。

皇室成员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等世家豪门的陪同下，仓皇逃到金陵，组建了东晋小朝廷。

由于曾经有过从割据到一统的辉煌经历，如今又被打回到起点，面对曾经被征服过的土地和子民，东晋的君王们多少有些尴尬。皇室的权威虽然不曾公开遭受挑战，但对这个国家产权的合法性诉求出现了问题，至少在中下阶层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基于东晋政府军基本已放弃北上收复失地的努力，大量的民间军事力量迅速成长起来，如著名的祖逖北伐，动用的基本上是自己的亲党力量；“孤胆英雄”刘琨长年坚守陷入胡人包围圈的太原，又何尝获得过东晋政府丝毫的物质和道义上的赞助？

我们说，在拥有国家产权这个问题上，即便古代中国的特点是家族私有、迥然有别于古希腊“主权在民”，仍得要具备必要的法理基础，非常时刻仅仅依靠血统合法性是不

在拥有国家产权这个问题上，即便古代中国的特点是家族私有、迥然有别于古希腊“主权在民”，仍得要具备必要的法理基础，非常时刻仅仅依靠血统合法性是不够的。



够的：东晋皇室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缺乏远见。当祖逖、刘琨这样倒贴本钱、主动效力的热血青年逝去之后，涌现出来的诸多非政府军事力量，则更倾向于将北伐的行动捆绑在自身利益算计考量之上。

桓温（312~373），就是其中一员。

从利益集团来划分，桓温不属于与东晋皇室有紧密关联的家族。他出生寒族，父亲桓彝，是晋帝国的一名中级军官，本来是无缘进入高层视野的，但在一次平叛的战役中为敌所害，总算用自身性命为桓温换来了前程。

桓温善征战，史书评价他“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且“用恢威略”。他率兵入蜀，为东晋消灭了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汉国。攻取四川之后，东晋政府拜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镇守江陵，有了可以筹集粮饷和军费的领地。此后，桓温的战争费用，得由自己承担。这一点，亦可看出东晋皇室的做甩手掌柜的心理，之后对局面的失控也因此变得在所难免。

桓温一生中有过三次北伐：

第一次在公元354年2月，桓温率4万大军从江陵出发，经襄阳，出武关，越秦岭，大军直指关中，讨伐由氐族人苻氏建立的前秦，秦王苻坚派5万大军对抗，大战于蓝田，秦军大败。桓温率军占领灊上，抵达前秦首都长安的郊区。当地老百姓纷纷牵牛担酒前来犒劳晋军。老人们流涕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但不久，因军中缺粮，桓温被迫退兵。

两年后，即公元356年6月，桓温再度北伐，还是从江陵出发，与羌族首领姚襄几番大战，大败姚襄，并收复洛阳。桓温在洛阳修复西晋历代皇帝的陵墓，又多次建议东晋迁都洛阳。东晋朝廷对此无所表示，桓温只得退兵。结果，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土地被慕容氏的前燕政权捡了个便宜。

两次北伐，都是因为东晋政府的态度暧昧，以不了了之告终。热血青年桓温那段时间大概会在郁闷中无聊度日